

目 錄

序一	鄭保羅.....	<i>i</i>
序二	梁秀珊.....	<i>iv</i>
序三	王紫珊.....	<i>vi</i>
作者簡介	<i>viii</i>
引言	陳睿文 周舒燕.....	<i>xiii</i>
第一部分	女性與聖公會差傳	
第一章	從跨文化角度研究中國婦女與聖公會 郭佩蘭.....	2
第二章	「聖省」的婦女事工： 對在華英國聖公會的考察 胡衛清.....	25
第二部分	聖公會與女子教育	
第三章	「婦女的進步是國家進步的前提」：中國武昌聖希理達 女中的社會福音（1929-1937） 劉夢白.....	50
第四章	從篤志女校看聖公會在近代北京的 教育活動 左芙蓉.....	79

第三部分 聖公會與女性按立

- 第五章 李添嫺的按立與事奉：對這一特殊事件的
歷史解讀 魏克利 (Philip L. Wickeri) 100
- 第六章 一項華人地區的卓越成就：香港聖公會首五位女牧師的
按立及其貢獻 周舒燕 黃慧貞 132

第四部分 女性與社會服務

- 第七章 多重視角下的聖公會女性知識分子：
以郭秀梅為個案 陳睿文 162
- 第八章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聖公會婦女傳道服務團
初探：以該團第四至第七屆大會報告書為基礎
段琦 191
- 第九章 香港聖公會的婦女與社會服務 李正儀 208
- 照片來源 222
- 書目 223
- 索引 237

引言

陳睿文 周舒燕

在福音書中，耶穌與婦女的相遇總是非常積極：祂曾與撒瑪利亞婦人井邊談道，昭示活水的意義（約 4:1-24），也曾讚揚婦女放下手頭事務，在其腳前聽道（路 10:38-41）。在祂受難時，婦女與祂同在（路 23:27）；在祂復活後，祂首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約 20:11-18）。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作為第一個接受耶穌基督的人（路 1:26-38），使基督在世的使命得以實現，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許多女權主義者視為婦女神學的先驅。耶穌基督與婦女的這些互動、對婦女的尊重，提升了女性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而婦女也因着對整部基督教史的參與，成為了世上的光。於在華基督教發展史上，亦是如此：單身女傳教士、傳教士配偶、女醫生、女護士、女教師等，不僅為教會作出巨大貢獻，也同時行進在諸如反纏足、反蓄婢、婦女教育、普世合一運動、禁酒等社會運動中，推動了建構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有鑒於過往幾十年來學界對華人教會與日俱增的研究興趣，也進一步為華人基督教婦女史——或者說——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語境下的基督教婦女研究打開了新的發展空間。相關作品從關注西方女傳教士本身的在華活動，逐漸轉至對華人基督教婦女的多層面觀照，展現出中西婦女在中國基督教史中的豐富型態。¹ 然而，集中從一個具體宗派傳統切入來探討基督教

婦女與華人社會的互動研究，則依然較為零星及薄弱。

聖公會於十九世紀早期來華，以其宗派傳統、聖品品秩、全面的聖公會領導制度及議會管理模式、獨特的公禱書及以禮儀為中心的特點而立於新教及天主教之間，但通常被視作為在華新教運動的一部分。來華聖公會主要包括英國聖公會、美國聖公會、加拿大聖公會等，自入華伊始，便廣泛藉由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傳播基督福音及建立教會，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² 1912年，中華聖公會於上海成立，標誌着華人領袖開始引領該會在華之發展。在聖公會在華發展的圖景中，婦女的角色或獨特、或微妙、或隱於幕後、或顯於堂前。³ 這些婦女包括來華的西方聖公會婦女（女傳教士、傳教士夫人等），也包括華人聖公會婦女本身。美國聖公會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派遣單身女傳教士，英國海外傳道會則在1887年起招募單身女性。入華的西方聖公會婦女透由福傳、醫療、教育等方式接觸到中國社會，並建立了諸如「東方婦女教育促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聖公會女部」(The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等團體以促傳教，並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先驅作用；華人婦女則或受傳教士影響，或受禮拜吸引，或通過醫院、學校等教會服務機構接觸到聖公會。作為當時的口號，「婦女的工作為婦女」(Women's Work for Women)使這些中西聖公會婦女相遇於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的動盪中國，兩者彼此協作、也各自透過不同方式參與、推動了在華聖公會的發展，共同在基督教與近現代中國社會相遇的背景下、在變幻

跌宕的時代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腳蹤。至十九世紀末，在華的聖公會婦女數量多於男性，且持續增長。到 1937 年，在中華聖公會中，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員是華人婦女；在該會的外國傳教士中，女性人數比男性多了一倍不止。同時，在皈依人數上，女性也超過男性。⁴ 至二十世紀，華人聖公會婦女在教會及社會中均取得了重要地位，影響與日俱增。聖公宗的女性按立議題便是其中一個例證。1944 年，在當時大多數聖公會人士持反對意見的情況下何明華 (R. O. Hall, 1895-1975) 主教按立了第一位聖公宗女牧師李添媛，使其成為了「上帝教會中的牧師」(Priest in the Church of God)，打破了先前男性任牧師的傳統，亦推動其後香港聖公會對四位華人女牧師的按立。儘管這曾在聖公宗內引起過爭辯、憤怒與不置可否，但卻標誌着女性在普世聖公宗內佔有重要一席。與此同時，聖公會對女性教育的重視，折射出該宗派旨在透過三重法碼之一的「理性」推動教育、為教會及社會輸出女性知識分子精英的特徵。而這些宗派語境下所呈現的特點，使聖公會婦女不僅在本宗派內，也在其他宗派更為廣闊的範疇下具有其特殊性及研究性。

2015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聯合舉辦的「從聖公會歷史看基督教婦女與華人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從一個具體宗派入手透視基督教婦女與華人社會之關聯。會議集結了來自北美、英國、澳大利亞、香港、中國內地的 20 多位學者，從跨學科、跨文化視角試圖鋪陳出聖公會婦女與華人社會、教會的種種互動，以還原這一圖景原本

的色彩及多樣性，彌補先前的研究空缺。

本書便是這一會議的部份成果。⁵ 內中主要涵蓋了英國聖公會（包括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 CMS）及英國海外福音傳道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簡稱 SPG））、美國聖公會與近現代婦女、華人社會之間的關聯。⁶ 集中探討了華南教區（維多利亞教區）、華北教區、浙江教區、江蘇教區、港澳教區等地的聖公會婦女。時間橫跨十九世紀前半葉聖公宗入華至 1912 年中華聖公會成立，再至當代情境。本書分為四部分，共收入九篇論文。第一部分「女性與聖公會差傳」考察了婦女與在華聖公會差傳的連接與互動，其中包括美國聖公會神學院郭佩蘭教授所寫的〈從跨文化角度研究中國婦女與聖公會〉。郭文運用跨文化視角，考察中國婦女透過與傳教士的接觸、教育機會等因素與聖公會所產生的互動及了解，並以英國海外傳道會女性事工為例，從更廣闊圖景考察了跨文化語境下的婦女事工，亦透過對按立李添媛一事的詮釋，強調了華人婦女之貢獻及全球聖公會後殖民主義意識的發展。另有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胡衛清教授的〈「聖省」的婦女事工：對在華英國聖公會的考察〉一文，通過詳實的史料，考察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聖公會海外福音傳道會進入儒學盛地山東進行傳教的歷史。文章展現了該會在婦女中傳教的情景，並在分析山東教會克服阻力發展的基礎上，呈現婦女在教育、醫療事工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繼而從地方政治、經濟和民俗文化角度分析傳教及婦女事工開展滯怠的原因。

第二部分為「聖公會與女子教育」，旨在呈現近代聖公會在華創辦女校、推行女子教育的相關圖景。所收文章包括美國聖地亞哥大學社會學系劉夢白教授的〈「婦女的進步是國家進步的前提」：中國武昌聖希理達女中的社會福音（1929-1937）〉。文章以美國聖公會在武昌所建的聖希理達女中為個案，運用採訪記錄、信件及廣泛的檔案，展現出二十世紀前期這所女校在歷史動盪中的創建及發展，以此反映該校社會福音的影響力。在嘗試闡釋其教育理念與策略的基礎上，刻畫出學校對當時中國女子教育之推動，以及對學生信仰、性格、生命軌跡之重要影響。與此同時，文章亦描繪出學校與社會在歷史沉浮中的張力所在。另有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歷史文博系左芙蓉教授的〈從篤志女校看聖公會在近代北京的教育活動〉一文，就英國聖公會在華北教區所創辦的北京篤志女校的歷史演變、教學管理、生源變化、歷史影響進行梳理，以反觀近代基督教對中國女子教育所起到的推動作用，並闡析這所教會女校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與劇變中的中國社會之間的關聯。

第三部分為「聖公會與女性按立」。該部分集中探討了聖公會的女性按立議題。其中包括香港聖公會大主教神學及歷史研究顧問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教授所寫的〈李添嫺的按立與事奉：對這一特殊事件的歷史解讀〉。該文運用李氏的親筆書信及此前未曾發掘的相關牧函，從歷史角度重構了李添嫺的牧職按立始末，詳實探究了聖公宗歷史上第一位女牧師被封聖職的原因、經過及影響。文章特別強調了李

氏的按立與其所在的歷史語境之間的複雜關係。與此同時，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周舒燕博士及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項目副總裁黃慧貞教授合寫的〈一項華人地區的卓越成就：香港聖公會首五位女牧師的按立及其貢獻〉，則以生動的筆法，呈現出香港聖公會在按立首五位女牧師上的具體過程。通過跌宕起伏的歷史重述，反映出香港的社會文化語境在聖公會女性牧職按立上所產生的艱難性及獨特性，以及香港聖公會對普世聖公宗、各宗派女性按立所作出的開創性的貢獻。

第四部分為「女性與社會服務」，該部分旨在觀測在華聖公會的婦女社會服務及事工。收入的三篇文章包括香港聖公會研究員陳睿文博士的〈多重視角下的聖公會女性知識分子：以郭秀梅為個案〉，該文以丁光訓主教之妻郭秀梅的生活與事工為中心，希冀建構出郭氏在不同歷史時段，透過美國聖公會教育、個人婚姻的締結及對教會、社會的參與所呈現出的多重角色，以此詮釋華人聖公會女性知識分子的獨有風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段琦所寫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聖公會婦女傳道服務團初探：以該團第四至第七屆大會報告書為基礎〉，以中華聖公會婦女傳道服務團第四至第七屆大會報告書為主要史料，從歷史視角探討了中華聖公會婦女傳道服務團的緣起及發展，以及該團在三、四十年代與教會、社會之間的互動及貢獻；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總幹事李正儀博士的〈香港聖公會的婦女與社會服務〉，則以香港聖公會為立足點，解讀英國海外傳道會對近代香

港社會發展的推動，並考量了自 1849 年以來聖公會在支持香港婦女權利、提高女性社會地位、為女性提供社會服務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等。

本論文集的出版，要感謝許多給予我們大力支持的人士及機構。在此要特別感謝香港聖公會鄭保羅大主教、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譚偉倫教授、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院長鍾嘉文 (Gareth Jones)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對於先期會議的大力支持，亦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崇基學院、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會、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對會議的舉辦所給予的慷慨贊助。

在成書的過程中，我們要特別感謝本論文集籌備委員會委員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副總裁黃慧貞教授、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研究員招璞君博士、香港聖公會大主教神學及歷史研究顧問魏克利教授對本書在修改及出版上所提出的大量寶貴建議。亦要感謝上海大學歷史系陶飛亞教授的大力支持。香港聖公會歷史檔案研究委員會眾委員在研討會籌備、舉辦、論文出版過程中給予了多年的關注，在此深表謝忱。他們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研究員招璞君博士、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主任彭培剛法政牧師、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胡寬德 (Stuart Wolfendale) 先生、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總監楊熙楠先生、香港大學歷史系高馬可 (John Carroll) 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 博士、香港浸會大學白潔蓮 (Gillian Bickley) 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黃文江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徐啟軒教授、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陳榮豐牧師、香港理工大學圖書館館長黃朝榮博士、沙田公共圖書館高級館長李景賢先生、聖雅各福羣會前總幹事賴錦璋先生、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副總幹事文孔義先生、香港大學林準祥博士及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行政助理練秀芬女士。

另要特別感謝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香港聖公會聖雅各堂匿名牧者及教友黎秀明小姐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慷慨資助。

伯明翰英國海外傳道會檔案館、香港聖公會檔案館、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應允我們使用相關圖片及資料，在此一併感謝。

亦要由衷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同工的悉心編輯，使本書能順利付梓出版。希冀這本呈現在您面前的論文集能為有關宗派傳統與基督教婦女及華人社會的關係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推進作用。

註釋

- 1 關注西方女傳教士本身的作品如 Leslie A. Flemming, ed., *Women's Work for Women: Missiona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of the Century China*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arol Marie DeSmither, "From Calling to Career: Work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to China, 1900-195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7); Eulenhoefer-Mann, Beate, "Missionary Work of Single German Women in China from 1888-1914: A Comparison between Missiological Theory and Praxis on the Mission Field" (Ph.D. Thesis,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School of Theology, 2003) 等。隨着研究範式的轉變，其後又有關注華人基督教婦女本身的作品，如 Lutz, Jessie G., ed., *Pioneer Chinese Women: 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Bethlehem, PA: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2); Wang, Hsiu-Yun, "Stranger Bodies: Women, 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1870s-1930s"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2003); 陶飛亞主編：《性別與歷史：近代中國婦女與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黃慧貞、蔡寶瓊編著：《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李湘敏：《基督教教育與近代中國婦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朱峰：《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 2 來華聖公會及與聖公會關聯的差會包括：美國聖公會（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of the U.S.A.）、英國海外傳道會（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英國海外福音傳道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加拿大聖公會（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澳大利亞聖公會（The Australian Board of Missions, Anglican Church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海外傳道會（Australian C. M. S.）、新西蘭差傳董事會（The New Zealand Board of Missions）、英國聖公會（女部）（The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都柏林大學差會（The Dublin University Mission）、基督徒知識促進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聖經教友宣教會（The Bible Churchmen's Missionary Society）、內地會（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另外一些在華事工的聖公會團體及教會包括：日本聖公會（Anglican-Episcopal Church in Japan）、顯榮光會（Community of the Transfiguration）、聖安妮會（Order of St. Anne）、東方婦女教育促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華北山東傳教協會（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ary Association）等。中華聖公會自身亦是一個傳教差會。參 "The Crisis of the Chinese Church: Memorandum of the Chinese and Missionary Bishops, May 1943," HKBU Archives of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MS Archives, Reel 384 "CHSKH, 1937-1950." R. G.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9)。

- 3 近年逐漸有少量聖公會婦女研究，如 Kwok, Pui-lan, Judith Berling, and Jenny Plane Te Paa, eds., *Anglican Women on Church and Mission* (New York: Morehouse Publishing, 2012)，林美玫：《婦女與差傳：十九世紀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差傳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5年)等。
- 4 Philip L. Wickeri,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Culture: Essays on Anglican and Episcopal History in China*, ed., Philip L. Wicker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8-9.
- 5 另一些參會文章則收入英文版，包括 Zhou Yun, “The Making of Bible Women in the Fujian Zenana Mission from the 1880s to the 1950s” (〈福建英國聖公會女部對女傳道的塑造 (1880-1950)〉)、Peter Cunich, “Deaconesses in the South China Mission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22-1951)” (〈華南英國海外傳道會的女會吏們 (1922-1951)〉), Frances Slater, “Born to Evangelise: the Wolfe Sisters of Foochow, China” (生而為傳教：中國福州的胡氏姐妹) 及 Jennifer R. Lin, “Zhan Aimei(1874-1943): An Ordinary Woman in Extraordinary Times” (〈詹愛美：不平凡時代的一位平凡女性〉)。詳參 Wong Wai Ching Angela and Patricia P.K. Chiu, eds., *Christia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the Anglican 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 6 是次會議論文主要集中於在華英、美聖公會婦女，對於在華加拿大聖公會、澳大利亞聖公會、新西蘭聖公會、日本聖公會等與婦女關係的研究，有待學界進一步探索及挖掘。

第一部分
女性與聖公會差傳

從跨文化角度研究 中國婦女與聖公會¹

郭佩蘭

李添嫻 (Li Tim Oi, 1907-1992) 是普世聖公宗第一位被按立為牧師的女性。在其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容我說，我們自當對男女一視同仁，一心一意做基督的見證。」² 在英美聖公會傳教士於中國建立教會的過程中，中國女性分擔了事工與對基督的見證。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各通商口岸對宣教工作進一步開放，此後，中國婦女漸漸加入教會，她們成為女傳道、訓導孩童並執教於主日學、參與詩班獻唱，且探訪醫院與家庭中的病患。她們支持並輔助教會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事工。然而，有關聖公會女性積極參與並貢獻於教會乃至全社會的事跡，至今既未被充分言說，也未經系統地研究。

基督教、性別及中國社會的研究頗為複雜，這是由於在現代中國歷史研究和傳教學的領域中，研究範式均出現了轉換。過去，對基督教傳教和中國婦女的研究主要着眼於傳教士的工作，而非中國婦女的工作。這些研究強調了傳教士在各個方面的重要性，諸如反纏足運動、

為女性提供教育及譴責納妾、包辦婚姻、殺害女嬰和虐待家庭女傭等方面，從而將傳教士刻畫成積極改變中國社會習俗和風氣的領袖，而中國婦女則是被動的追隨者。歷史學家柯文 (Paul A. Cohen) 批判了在中國歷史研究中所運用的這一「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範式 (Western impact - Chinese response，簡稱「衝擊—回應」範式)，認為這一範式傾向於將歷史相遇中的中國人視為被動及回應式的。³ 若沿用該範式，則中國婦女的媒介作用將會被低估，而中國的社會環境則僅作為傳教士活動的背景。

若說上述範式固化了傳教士在解放中國婦女中的作為，那麼「文化帝國主義」範式 (Cultural imperialism model) 則視基督教傳教為藉重疊西方文化價值和風俗而實現西方統治，即前者是後者的組成部分。⁴ 從1949年直至近期，這一範式是在華基督教傳教歷史書寫的主導觀點。自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其他詮釋開始浮現，並出現了更多細緻的分析。一些中國學者重新評估了基督教傳教的遺產、基督教大學的貢獻以及中國女性與基督教的相遇，力圖得出更為細節的詮釋。⁵ 在這一時期，傳教研究的焦點也有所轉移。傳教學學者達娜·羅伯特 (Dana L. Robert) 指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學者趨向於突出傳教士在殖民主義中的角色。而在九十年代，學者開始更多地關注傳教士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的經歷及他們與本地人之間的實際互動，研究焦點因而出現了轉移。⁶

柯文同時批判了這兩種範式。相對於將民族歷史從屬於西方歷史

敘事的「西方中心論」(Western-centered approach)，他提出了一種「中國中心論」範式 (China-centered model)。柯文的「中國中心論」「從中國處境的中國問題出發」，設法去理解過去中國歷史的內在結構和方向，並認識到這一歷史是由過往發展而來的。⁷ 該範式並非如「西方衝擊」或「文化帝國主義」範式那樣從西方出發，而是始於中國人，並以之為主角來展開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互動場景。柯文的「中國中心論」並不意味着將中國從世界孤立出來，他也明確表示不想「復興古早的『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 觀念，此觀念暗示了世界以中國為中心」。⁸ 當柯文的書在 1984 年出版時，它旨在糾正美國對現代中國歷史書寫中的西方偏見。然而，此後出現了兩方面的發展，要求重新思考「中國中心論」的適用性。其一，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經濟有了顯著增長，由此催生了一種新的文化國族主義 (cultural nationalism)，包括對中國文化特定方面的具體化及對中國夢和中國必勝論 (the Chinese dream and triumphalism) 的推崇。⁹ 由此，提倡「中國中心論」可能無意中正中當權者下懷，以用來支持一種排他的國族主義；其二，在全球化的時代，學者越來越多地使用跨國方法 (transnational approach) 來研究文化和歷史，關注超越國界限制的關聯、比較及爭論。

在本章中，筆者提出在對中國婦女與在華聖公會 (the Anglican Church in China) 的研究中，採用一種跨文化方法 (cross-cultural approach) 來進行詮釋。談及「聖公會」(the Anglican Church)，筆者意指由英國聖公會 (Anglican) 及美國聖公會 (Episcopal) 傳教士在華所建

立的教會，1912 年均併入中華聖公會（Chung Hua Sheng Kung Hui，縮寫 CHSKH）。筆者提出的跨文化方法有以下幾個特點：(1) 該方法將傳教運動視為現代性全球化的一部分，後者改變了西方以及中國社會。在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影響了傳教士的視野以及他們與女性共事的策略；(2) 該方法採取一種超越中西方的更廣泛的比較方法，來比較女傳教士在中國、伊朗、印度及烏干達社會中的工作；(3) 該方法突出了在全球普世聖公宗中，中國婦女在按立女牧師及後殖民意識發展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中國婦女與聖公會故事

中國婦女與聖公會的故事，為多樣化語境中的性別、宗教及文化進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有趣的個案。儘管，與聖公會及其傳教活動相關的中國婦女人數不多，但她們卻是一羣接觸到新式宗教理念、教會實踐、基督教學校及其他社會服務的女性。她們與聖公會相遇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的動盪巨變中。其間，中國人對女性性別的觀點也發生着轉變。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 1958 年，即自傳教工作伊始到中華聖公會不復存在，中國在西方及日本勢力下遭受了屈辱與挫折。中國知識分子和改良派曾提出社會與文化改革，意圖挽救國家免於外族侵略。對於性別角色和婦女社會地位的爭論，就發生在社會各界有關中國文化、國族主義、農民改革及革命前景的激烈探討中。

對中國婦女和聖公會的跨文化研究，需避免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建